



文艺研究新视野

20shiji zhongguo wenxue de wenhua chuangzao

20世纪中国文学的
文化创造

李继凯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继凯等◎著

20shiji zhongguo wenxue de wenhua chuangzao

20世纪中国文学的
文化创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李继凯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04-8407-3

I. ①2…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3646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8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抁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以引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姬，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全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这就把伦常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更杰出

的创造，是把炼石补天神话的终点当作新起点的创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女娲炼石补天时被弃置的一块顽石当作通灵宝石，带到人间走了阅尽繁华与悲凉的一遭，写成了“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精神启示录。由五色石引爆的这些奇正创新，综合创新和跨越式原始创新的丰富思路，应该成为我们书系的向导，引导我们进行根柢扎实，又五彩缤纷的学术探索，或如宋朝一位隐居黄山的诗人所云：“我有五色线，补衮衮可新；我有五色石，补天天可春。”（汪莘，《野趣亭》）

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世界视野空前开阔，创新欲望空前旺盛，学理思维空前活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思想学术文化已经以其无比丰厚的成绩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也迎接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扑面而来的机遇中的严峻挑战。高科技对文学生存方式的强势介入，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批量性推动，消费时尚对文学潮流的极端吸引，以及网络、图像参与其间的新媒体文学表达形态，包括林林总总的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文学等形态的火爆滋生，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今日之文学已远非昔日之文学了。对于原有的文学格局、形态和秩序而言，这里所面临的泛化性的消解和创新的包容的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当今学术界的学理担当能力。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一些与女娲神话类似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危机，大概也不应被看作是危言耸听吧。那么，又从哪里找到补苍天的五色石，立四极的鳌足和止淫水的芦灰呢？若能够由此写出女娲炼石补天的新篇，也是本书系不胜翘首企盼的。

令人满怀信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百摧不磨，往往在艰难的挑战中出现超强度的爆发，在爆发中显示了坚毅的魄力和深厚的文化元气。浩瀚雄厚的多地域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实践，成为它层出不穷地为人类提供文化经验和创新智慧的不竭源泉。且不说旷世莫比的少数民族神话，即便中原神话虽未衍化为长篇英雄传奇，却散落为遍地开花的民俗奇观。五色石在历朝志怪和许多地理志中，屡有记载，女娲庙在甘肃秦州有，湖北房州也有。女娲抟土造人处据传在汉武帝《秋风辞》吟咏的汾阴，女娲墓则在九曲黄河最大的弯曲处古潼关附近的风陵渡，因为女娲风姓，风陵也就成了娲皇陵了。中华民族是把自己的母亲河和这位创世女神连在一起的。五色石散落之处

有广东产端砚的山溪,《元丰九域志》云:“端溪山有五色石,上多香草,俗谓之香山。”明代诗人说:“女娲炼馀五色石,藏在端溪成紫霞。天遣六丁神琢砚,梦中一笔夜生花。”(张昱,《题端古堂》)既然五色石散落岭南,那么炼石的灶口在哪里?在太行山。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说:“石炭即煤也……(山西)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五色石通过创世女神之手,成为一种天地交泰的文化生命结晶,它一头联结着赋予人类生存以温暖的“坚黑而光”的能源,另一头联结着文化创造的“梦笔生花”的灵性。在如此浩瀚无垠的天地、人类、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造,尽管阅尽风云变幻的价值重建、形式变换和文学边界模糊,但我们的民族也有足够的底气、智慧和能力,在文学研究中注入充满活力的人类审美本性的精髓,从中焕发出现代大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品格和创新气象。

明诗有云:“五色石堪炼,吾将师女娲。”(周瑛,《至广德作东园书室》)是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调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给出新阐释,师法女娲炼石补天的原始创新行为,炼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大国的思想学术的五色石的时候了。

杨义

2008年6月1日

目 录

绪论 世纪之碑的铸造	(1)
第一节 文艺文化学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阐释	(3)
第二节 从文化三层面看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	(19)
第三节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	(29)
第一章 新文化语境和新文学创造	(38)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语境与新文学创作	(38)
第二节 启蒙热与文学热的兴起	(42)
第三节 新文学的六大文化母题	(49)
第四节 现代白话:语言革命的文化意义	(59)
第五节 五四新文学与出版业的互动效应	(73)
第二章 社团流派与文化创造	(89)
第一节 综合性思想文化期刊与社团流派	(90)
第二节 竞争和创造: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	(94)
第三节 “百花齐放”与文化创造	(105)
第三章 文学大师的文化创造	(111)
第一节 文化创造的尺度与文学大师的定位	(112)
第二节 不同类型文学大师的风范	(119)

第三节	大师的文化品位及其影响	(122)
第四节	准型大师与诺贝尔文学奖	(139)
第四章	各体文学的创新追求与文化创造(一)	(146)
第一节	现代文学文体探索的先驱:以鲁迅为中心	(147)
第二节	现代小说“三通”境界的追求:以张爱玲为中心	(183)
第三节	双城书写:《边城》与《围城》之比较	(207)
第四节	形象创新:30 年代小说中的女佣形象塑造	(214)
第五节	创业文学的文学史价值:以柳青为中心	(224)
第六节	现代话剧艺术的创造者:以曹禺为中心	(233)
第五章	各体文学的创新追求与文化创造(二)	(243)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诗歌的文体创新	(243)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诗歌的文化意义	(264)
第三节	绅士风与家常味的调和:以梁实秋散文为例	(270)
第四节	现代散文的文化分析:以台湾女作家散文为例	(279)
第五节	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以当代文学的灾害书写为例	(301)
第六章	世界化与民族化复合性的文化选择	(314)
第一节	外来文化的“来而能化”	(314)
第二节	翻译文学的文化创造功能	(326)
第三节	会通中西的文学创作取向:以路遥为中心	(337)
第四节	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激活:以西部文学为例	(350)
第五节	民间文化与作家的文学创作:以沈从文为中心	(362)
第六节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追求:以回族文学为中心	(375)
第七章	文学批评、媒体和文化创造	(382)
第一节	文化视阈中的现代文学批评	(382)

第二节 批评模式的建构:以新时期比较批评为例	(387)
第三节 内在的渴望:主体性文论的个案分析	(397)
第四节 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和原创性	(410)
第五节 媒体传播与现代文学:以《新青年》为中心	(414)
第八章 现当代文学教育与学科建构的文化意蕴	(434)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高等教育	(435)
第二节 文学史研究: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	(460)
第三节 学术文化建设与现当代文学学科	(465)
结束语 面对未来的文化心态和思考	(481)
主要参考文献	(507)
后 记	(518)

绪论 世纪之碑的铸造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全球化与民族化、文化整体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西方化与文化东方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甚至对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等文化现象都仍在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其贯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可谓是根深蒂固，影响深巨。其实在文化实践层面，笔者以为人们的文化主张固然可以不同，但对“文化创造”的期待与追求才是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所在：新型的也是真正具有现代性或兼容性的“文化创造”恰是 20 世纪中国志士仁人（包括优秀文学家）共同的美好愿景，同时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别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人类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无疑，文化抉择上的困境总是存在的。但究竟如何才能逐渐走出困境呢？我们的 20 世纪文化先驱者实际早就给予了相当明确的回答，这就是要在中外文化的结合、创新上大做文章，对于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都应给予重新审视和力所能及的改造，从“拿来主义”进至“创造主义”，既不是简单的“中体西用”（根本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有限度地整合、利用西方文化），也不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西方什么都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是勇于进入世界性的跨文化语境，努力追求和建构有别于中外传统文化的新型文化，这显然只能通过多元文化的有机结合这样的文化实验（这也许类似于“化学实验”），反复摸索，坚持不懈，融合创新，才能取得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创造新的文化语境，凝练新的文化话语。简言之，由此也昭示着通过“文化习语”走向“文化创语”的路径与规律。

这种通过“文化习语”走向“文化创语”的创造文化（尤其是文学文化）的思路，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和作家梁启超、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

沈从文、巴金、张爱玲、曹禺、穆旦、林语堂、赵树理、丁玲、王蒙、北岛等甚至是林纾、陈寅恪、吴宓那里，都有或显或隐的体现。他们其实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版图中具有突出个性特征的“这一个”，尽管他们有时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偏颇”，抑或其文化主张和价值体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却实际都在关注着、思考着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和未来命运，都在文化策略上千方百计谋求着属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文化创造；他们的具体文化主张和文化追求确有许多不同之处，见解与爱好因人而异，但在共同渴望有新的文化创造方面确实也都在费尽心机，殚精竭虑，求索不止，都有一颗宝贵的“创造性心灵”，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创造文化圈”。这也就是说，尽管他们一生的文化创造的成就有所区别，各自存在的历史局限或教训也无法避免，但他们都有各自的新的文化创造（包括文学文化创造）则是无疑的——即使文化保守主义的“与古为邻”有时也可以“与古为新”，并与文化激进主义一起发挥各自的文化功能（比如相反相成）而共同创造了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化或新文化（现代文学或新文学）。尽管“如今学界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①。但笔者仍然坚信，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尤其是文化国力的不断增长以及文化交流的持续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给予承认和称扬的人也必然会越来越多，并在“新兼容并包主义”或“新国学”格局中必将形成一种属于中华民族也将属于人类的“共识”。且总会有人像重拾西方文学传统那样“光顾”20 世纪中国文学，从中领略几代作家、批评家继承、借鉴和创造的艰难困苦和喜怒哀乐。即如业已成为昨日之梦的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在北岛心灵深处珍藏的记忆中，却是永恒的。^② 在甘阳心目中，80 年代文化热是继五四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如今，“‘80 年代文化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意识的一部分，而对许多参与者而言，80 年代不但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他还将 20 世纪 80 年代称为最后的“文化人时代”。^③ 也就是在 80 年代，

① 参见 [美]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1994)，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北岛：《时间的玫瑰》的“序言”（柏桦），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再版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有位立意探索、满怀激情的青年学者就曾写下这样的“前言”——“当人们回首科学史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时，常常会为前辈们各种神奇的创造而感叹。面对着阿基米得、欧几里得，直至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与爱因斯坦的巨大业绩，犹如面对着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英雄’交响曲和‘天鹅湖’、《哈姆莱特》与《红楼梦》一样，各种年龄的人都会像天真烂漫的儿童一样问道：他们是怎样创造的？……”^① 进入 21 世纪并经常“前瞻后顾”的我们，早已不再天真烂漫，但对业已成为过去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却也同样会发出类似的但可能是非常艰难的追问：20 世纪中国文学到底是模仿的赝品还是创造的“作品”？究竟有否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和价值生成？对此“大是大非”问题显然应该给予积极的回应，情绪化的吹捧和贬损以及满足于客观陈述文学史实（放弃价值判断）的言说都无助于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目前我们非常需要的是既具有学理性又具有实证性的深入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受限于条件不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相关论述一定要切实有力并具有启示性。

第一节 文艺文化学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阐释

中华民族创世女神女娲曾留下了“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神话，一代女杰武则天曾留下了任后人评说的“无字碑”，而在我们看来，20 世纪中国作家则用生命铸造了一座恢弘的“有字碑”，用有力有为的书写建立了一座不朽的“世纪之碑”。而这“有字碑”或“世纪之碑”的铸造和建立，本身就是个艰苦卓绝的创业工程和创新工程。20 世纪中国文化的、文学的丰碑，就凝结着中国现代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心血和汗水。

为了维系和发展人类社会，创造和守护先进文化几乎就是“人”的本能和宿命。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中，唯有能够进行“以人为本”的文化创造。

^① 周义澄：《科学创造与直觉·前言》，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劳动或创造化育人类，创造与人类同在共进。人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都绝对离不开创造，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史。无数事实证明，文化创造对人类社会具有特别巨大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创造是文明进化的催化剂，是历史飞跃的加速器，是事业成功的突破口，等等。拥有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人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骄傲，是人类当之无愧的文化英雄。“主体只有从事创造活动，才能获得创造成果”乃是创造学的公理。^① 无论创造的文化成果形式如何，都必然要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要有“新”的性质，“新”是创造的核心或本质属性。而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文学创作，自然也要体现这样的文化创造的基本特征；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自然也要承担起创造和守护先进文化的重大使命。马克思曾指出：人的创造活动就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还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强调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 可以说，继往开来的 20 世纪中国作家即主要是按照现代美或现代性的规律来创作，在激活自己的“知、情、意”心理潜能的前提下，积极投入文学实践中去，且建构了相当健全的“创造动力机制”——理想信念出创作欲，需要出原动力，危机出竞争力，好奇心出青春活力，自强不息出进取力……^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学”，如果说“创造学是一门改变人生命运、觉悟人生最高境界的学问”，^④ 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者们不正是为了改变人生、感悟人生从而将“文的觉醒”引向“人的觉醒”吗？！

人要创造文化包括进行创造性写作的“创作”，就要从自身的需要出发，从人的主观要求和爱好兴趣出发，进行一定的价值选择。文化的价值选择，既存在着必然性，又存在着自由度。不断的文化选择促成了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其变化的基本规律则是由文化的两个基本特性决定的：“人类的文化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创造性，一是继承性。”^⑤ 而创造性与继承性的实现，都是离不

① 甘自恒：《创造学原理和方法》，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85 页。

③ 参见严智泽等主编《创造学新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 页。

④ 刘仲林：《中国创造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⑤ 蔡俊生、陈荷清：《文化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1 页。

开“积极的有价值的人类活动”^①。这种“积极的有价值的人类活动”，是指以正面价值选择为前提的能够促进人类前进的人类活动，其中始终贯穿着人类主观的价值选择。它们都是文化发展的促进因素，都是“文化创造”应包含的合理成分。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创新变革，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无一例外地要面临继承与创造的问题。具体到某个作家，则要遵循先继承文化遗产（不限于民族或阶级的），而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规律。这是因为个人总是处于文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只能在接受现有文化后才会进行创新活动。作家的创新活动是伴随着作家主体独立的文化选择实现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不同个性的文化之间普遍存在着文化交流现象。文化交流是指个性文化之间经常发生的不同文化要素的相互交流与借鉴。这种文化要素的相互交流可以省去单个文化发展过程中重复性的文化创造，可能起到使双方取长补短，共同丰富的作用。但是在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要素只有黏着在本土文化模式之上，才为其所吸纳，否则即遭排斥，弃而不用。也就是说，在文化交流中，也存在着文化的选择。一种文化要具有活力并拥有未来，其必须面对的是以选择为前提的不断创造与继承，在此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关系。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发展过程亦当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探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或现当代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文化创造，亦当关注价值选择与重建、尊重客观规律与过程，注意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非主观臆断。

—

当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先生在 1985 年联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宣读并旋即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显然意在努力建构新的文学史格局，其重绘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议在文学史研究中确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

^① 蔡俊生、陈荷清：《文化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9 页。

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①而在这样的“世纪性”的追求过程中，我们相信必然伴随着一系列错综复杂而又艰辛备尝的个体的和集体的文化创造活动。比较此前保守状况，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无疑相当活跃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文艺（文学）文化学认为：文艺创作是充分调动和利用文化资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活动；与此相应，文艺研究也可以充分利用文化资源来反证文艺创作，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文艺研究，扩大文艺研究的范畴，使文艺研究顺理成章地进入广阔的社会文化及人文精神领域。文艺文本的存在和传播是对个体文化活动的召唤，而其个体的接受过程其实也是社会性的群体文化建构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所构成文艺活动的整体，旨在克服外在世界对人的疏远性并让人直观地感受自己，提升自己，旨在承载并发展文化精神并优化人的文化行为，同时文艺也激发文化的革新与重构。^②就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而言，作为体现文化的文学显现着统一性和特殊性；作为创造文化的文学则突出地显现着主动性和创新性。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多层面无疑都各有价值可寻，但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角度与现实需要来看，“作为创造文化的文学”或文艺则具有更大的价值，也更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唯有对创造新的文化语境有重要贡献的文学，才是最值得我们予以珍视的。因为，现代作家如果不能通过现代性的言语活动从事现代语境的创造，在整个社会文化转型中无所作为，那么，这些作家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就非常可疑了。

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在《新文学的传统》^③的“序”中说：“‘文学革命’以来，文学史家耕耘最勤而收获最大的那块园地也即是我国固有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胡适简称之为‘白话文学’）。因此我可以说‘新文

①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② 参见畅广元等《文学文化学》（“绪论”部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1979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初版，新星出版社2005新版。

学的传统’，不单指现代文学，也包括了属于同一传统的古代文学。大体说来，它是有别于士大夫文学那个传统的传统。……受过西方新思潮洗礼的现代作家、文学研究者当然更自觉自发地在创造‘新文学’，在建树中国文化、文学的‘新传统’。”事实上，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某些东西，如入世精神，关注现实人生；写实主义等，在进入20世纪后并没有被“反”掉，反而在新时代得到了真正的发扬光大或置换再造。而文学的文化创造，有的是原创性很强的，有的也仅仅是在“发扬光大”或置换再造中体现出文化创造的追求。

从这样的角度来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以为，20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体现为渴望创造“现代新型文化”的文学创造精神与业绩，这也可以视为新文化语境创造者的主要动机。而这种“新传统”业已成为民族文化再生和发展的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从现代物质文化（如报纸杂志、稿费收入等）、制度文化（如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等）和精神文化（如个性解放、自由主义等）或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流行文化、性别文化等不同层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但还缺乏整体有机的把握，特别是对这些文化影响文学的复杂性，对文学的“文化创造”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还有，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价值判断。目前在国内外存在众说纷纭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认为很有必要从“文化创造”这一特定角度，来集中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它的文化价值的创造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欠。这一特定角度的研究，对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是有一定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的，对“新虚无主义”的泛滥有批判和纠正的作用。如果能够运用“文化辩证法”，实事求是地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的成就和局限，对世界文化（文学）的贡献及存在的明显不足，就可以对中国这一个世纪的文学给出客观的评价，其经验教训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借鉴的意义。笔者坚信，中国人曾经并将继续创造灿烂辉煌的现代文明，但这又必然是一个艰难求索、费时费力的复杂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20世纪也仅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关键作用（如文化转型）的历史单元而已。

人是创造的主体，创造常有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要发挥各种潜

在力量来克服困难，最终才能获得新的文化成果。无论成果形式如何，但都必然要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要有“新”的性质，“新”是创造的核心或本质属性。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便无疑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从而获得了自己基本的历史价值和重要地位。没有文化创造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是空洞的，但中国 20 世纪发生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却是收获甚丰的。有人简单地看待中国 20 世纪文学甚至将其基本视为“垃圾”、“次品”或“赝品”，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众所知，20 世纪更是一个崇尚创造的世纪；20 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崇尚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世界。无论是欧洲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英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美国建国所确立的人权至上准则，还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科学、民主、自由”意识以及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现代化建立场，都凸显出对“人道”精神和“人造”意识的提倡、发扬（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是“人道”与“人造”的珠联璧合，使原来破败凋敝的中国变成为“人财两旺”前景可喜的渐渐腾飞的东方巨龙）。在此基础上，觉悟了的思想家、政治家、文艺家、科学家引导人类学习用自己的眼睛、头脑去由浅入深地认识、观察和改造客观世界，学习培养一种主人翁意识。在这样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世界中，作为“人学”的文学便昂首阔步走在人道主义的道路上，开始努力与世界文学接轨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自然也不例外。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以及具体化的人道主义文学（人道主义的抽象理解在实践也包括文学实践中却经常很难贯彻到底）绵绵不绝，新时期以来更是蔚为大观。即使阶级斗争文学也经常经常在革命的人道主义名义下，弘扬着白毛女式的“翻身得解放”的革命主题，并在特定“突出政治”的历史时期成为民族重建总主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冷静地说，从宏观文化史的视野来看政治文化影响下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在看出其独具特色的同时，亦能看清其文化道路的曲折和文化误区的广布，同时也能够充分理解阶级斗争与阶级文学发生的必然和无奈。因为从人类与民族的文化史来看，也可以说讲阶级斗争正是一种文化策略（但不是政治纲领，一旦如此定性并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则必酿灾难），尤其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时期，或对那些处于被残酷压迫的底层阶级而言，不讲阶级斗争，不注意阶